

卜筮简研究综述

冯 华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387)

上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先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 4 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曾经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上世纪伊始,即有大批战国楚简出土,这些楚简材料为研究战国时代楚国社会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楚简中有一类材料是对于当时卜筮情况的记录,称为“卜筮简”,如望山 1 号墓简,天星观 1 号墓简,秦家嘴 1、13、99 号墓简,包山 2 号墓简,新蔡葛陵墓简。战国时代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卜筮简对于了解研究战国时代楚地卜筮、礼祠制度和宗教信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卜筮简的出土

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共有五批卜筮简陆续出土。

1965 年冬,首次在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中发现卜筮简材料。出土竹简经拼接后共计 207 枚。竹简内容主要是为墓主悼固进行占卜的记录。悼固是楚悼王曾孙,可能生活在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

1978 年 1—3 月,湖北江陵县天星观 1 号墓出土整简 70 余枚,简文内容有“卜筮记录”和“遣策”。墓主为鄢阳君番胜,他并非楚国王族,其下葬年代应晚于公元前 361 年,大约在公元前 340 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

1986 年 5 月—1987 年 6 月,在湖北江陵县所辖秦家嘴铁路段上共发掘楚墓 105 座。出土竹简的墓有三座:M1 出简 7 枚,M13 出简 18 枚,内容皆为卜筮祭祷之类;M99 出简 16 枚,内容除卜筮祭祷外,还有遣策。这三座墓均为小墓,墓主可能是下层官员或平民。

1986 年 11 月—1987 年 1 月,在战国楚故都纪南城北 16 公里的包山冈发掘五座战国中晚期大墓。其中 M2 出土竹简 448 枚,竹牍 1 枚。竹简按内容分为文书、卜筮祭祷记录、遣策三大类,其中卜筮记录简有 54 枚。包山 2 号楚墓墓主为左尹昭 𢇛(佗),系楚昭王后人,生活在楚怀王时期。

1994 年 7—8 月,河南省新蔡县葛陵故城东北部的大墓出土竹简总计 1571 枚,但竹简出土时已全部残断。新蔡葛陵楚墓墓主为平夜君成,乃楚昭王之曾孙,平夜文君子良之孙,墓葬年代可能在楚悼王末年。

楚国自楚文王始迁都江陵,史称郢都,就是后来的纪南城。望山 1 号墓简、天星观 1 号墓简、秦家嘴墓简、包山 2 号墓简均出土于古郢都附近,地缘相近。河南新蔡古称“繁阳”,战国时代楚国疆域已经延伸至河南南部一带。这五批卜筮简年代大致上都处于战国中晚期,时代

相去未远。望山1号墓墓主悼固、包山2号墓墓主昭佗、新蔡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均为王室血脉、半姓分枝。从所记录内容性质相同,出土地缘相近,时代未远,墓主具有密切关系等方面考虑,这五批卜筮简可作为同一类内容进行综合研究。

二、卜筮简的定名

卜筮简出土之后,即有学者对简文进行整理,望山1号墓竹简、包山2号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已经有专书公开发表。天星观1号墓竹简和秦家嘴1、13、99号墓竹简的简文虽未公开发表,但亦有相关研究论著。卜筮简是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关于卜筮简的定名首先引起了热议。

(一)望山1号墓卜筮简的定名。对于望山1号墓卜筮简定名共有三种意见。

1. 祭仪文稿。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5年第5期)认为,1号墓竹简“从文字内容初步观察,似属几篇论述‘祭仪’的文稿”。

2. 占卜记录。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江陵昭固墓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77年第2期)指出:“这批竹简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详略不拘、没有固定格式的杂事札记,其主要内容似可以说是悼固的家臣为悼固的各种疾病向先君先王及神祇祝祷,或为其他的事贞问占卜的记录。”

3. 卜筮记录。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望山1号墓竹简的性质和内容》(收入《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通过对这组简文进行考释研究后,亦认为“望山1号墓竹简是为墓主悼固卜筮的记录”。

(二)包山2号墓卜筮简的定名。对于包山2号墓卜筮简定名共有四种意见。

1. 卜筮祭祷记录。包山2号墓出土卜筮祷祠记录简共54枚,整理者分为26组,认为每组记一事,分为卜筮与祷祠两类,并且《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收入《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称之为“卜筮祭祷记录”。

2. 卜筮简或占卜简。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及文学系1993年版)称之为“卜筮简”。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指出,除4组“祷祠”简外,“其他都是占问‘祷祠’,并且‘祷祠’只是两次占卜中第二次占卜的内容之一”,所记“‘祷祠’是预卜中事。所以我们的看法是,这类简文最好还是叫‘占卜简’,而不宜称为‘祷祠简’或‘卜筮祭祷记录’”。

3. 卜筮祷祠记录。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认为,4组“祷祠”简可以视为22组“卜筮”简的附录,以“卜筮简”或“占卜简”概括全部26组简书,是有道理的;为了表明祷祠简与卜筮简的区别,将那4组简书单独称为“祷祠简”,在对全部26组简书合称时使用“卜筮祷祠简”或者“卜筮祷祠记录”,应该也是可以的。

4. 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比照甲骨卜辞将这类简文称为“竹简卜辞”。

对于卜筮简定名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关于卜筮简性质问题的认识。从关于卜筮简定

名的讨论中,可以大致地归纳出对于卜筮简性质认识的三种意见。

1. 祭仪文稿或祷祠简。认为此类简文只是关于“祷祠”的内容。

2. 卜筮简、卜筮记录、占卜记录、占卜简或竹简卜辞。“占卜”和“卜筮”语意相同,卜与筮是两种最主要的占卜方式,用龟曰卜,用策曰筮。卜筮简、卜筮记录、占卜记录、占卜简和竹简卜辞的共识是这类简文只有“卜筮”一个方面内容。

3. 卜筮祷祠记录或卜筮祭祷记录。“祭祷”和“祷祠”是同义词,“析言则别,浑言则同”,单独使用时都是泛指祭祀。“卜筮祷祠记录”与“卜筮祭祷记录”所表达的意义是相同的,二者均认为这类简文包括“卜筮”与“祷祠”两个方面内容。

我同意第2种意见,将这批简文称为“卜筮简”。包山2号墓54枚竹简,整理者将其分为26组,其中22组为卜筮简,4组为祷祠简。这22组卜筮简是为左尹昭佗进行占卜而做的记录。古人卜筮一般都有记录以备考查(朱德熙等《望山1号墓竹简的性质和内容》)。这22组卜筮简可进一步分为5套“成套卜筮辞”,每套“成套卜筮辞”共卜一事,或以“三卜”、或以“四卜”、或以“五卜”。在包山楚简卜筮辞中,每次占卜之后的卜筮辞均云“恒贞吉”,但一般情况下总是“有祟”或“少有不顺”,必须“以其故说之”,这是通常的占卜结果。占卜最主要的目的是祷祠神祇以“说之”,“说之”后面的内容为如何祷祠神灵,这些内容称为“祷辞”或“说辞”。“祷辞”是占卜结果,是占卜的一部分。另外所谓4组祷祠简按内容分为两组,简205、206为一组;简224、225为一组。简205、206是对于第1套“成套卜筮辞”占卜执行情况的记录;简224、225是对于第3套“成套卜筮辞”占卜执行情况的记录。22组卜筮简中也有这种“成套卜筮辞”占卜执行情况的零星记录可见。简205、206和简224、225是对“成套卜筮辞”占卜执行情况的记录,是附属于“成套卜筮辞”的。这两组简并不是独立记录祷祠情况的,不可以相对于“卜筮记录”而独立存在。在包山简之外的卜筮简中未见这种占卜执行情况的记录。因此,将这类竹简定名为“卜筮祭祷记录”是不合适的,而应将这类简文称为“卜筮记录”或“卜筮简”。

三、卜筮简研究的回顾

楚简材料是战国文字研究的重要资料,楚简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一批楚简的研究大致都要经历四个阶段,卜筮简的研究也不例外。

(一) 出土报告阶段。1965年冬首次在望山1号墓中发现了有关卜筮内容的竹简,为研究墓主身份和下葬时间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楚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物》1966年第5期刊发了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撰写的《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一文,刊登了部分竹简的照片和摹本。

1978年1—3月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一批卜筮简。《光明日报》1978年7月23日报导了墓葬出土文物的情况。《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发表了由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撰写的《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对卜筮简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1986年5月至1987年6月间,在湖北江陵秦家嘴的M1、M13、M99三座楚墓中出土了卜筮简。荆沙铁路考古队撰文《江陵秦家嘴楚墓发掘简报》发表在《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对出土卜筮简的情况做了介绍。

包山2号墓卜筮简最早的报导刊登在《文物》杂志1988年第5期。由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撰写的《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报导了包山楚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包山2号墓竹简概述》则详细介绍和论述了出土简牍的情况、价值和意义。

1994年5月在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葛陵村东北的平夜君成墓中出土了内容较为丰富的卜筮记录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撰文《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8期,对卜筮简的情况做了介绍。

(二)图版和释文出版阶段。1995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的《望山楚简》,完整地公布了这批竹简的照片和释文,并附有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对简文的考释。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由商承祚编著的《战国楚简汇编》,也收录了望山1号墓出土的竹简内容。

1991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包山楚墓》和《包山楚简》,书中印有竹简的全部照片,详细介绍了包山简牍的出土情况和简牍形制及其主要内容,并对简牍作了释文和考释。

2003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书中的图版有竹简的照片,附录一为贾连敏的《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

天星观1号墓和秦家嘴卜筮简目前仍未正式刊布。2008年许道胜《天星观1号楚墓卜筮祷祠简释文校正》(《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对天星观1号墓卜筮简的释文作了全面校正。2005年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辑录了秦家嘴3座楚墓出土的部分卜筮简文,并对这些简文进行了拼接和考释。

(三)广泛研究阶段。卜筮简自刊布之日起,便作为一种新的出土古文献材料受到学术界瞩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卜筮简图版和释文出版之后,学者很重视对卜筮简的文字、词语的重新释读。如包山简203祷辞中有“(舆)石被裳之说”一语,“”即“舆”,李家浩《包山楚简“箴”字及其相关之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将其读作“与”,训作“从”;又将包山简204中的“箴”读作“毕”。李家浩《包山竹简所见楚先祖名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史》总42期,1997年)、何琳仪《楚王熊丽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将包山简246原释文之“熊绎”改释为“熊丽”。对于卜筮简文字、词语的正确释读有助于对卜筮简文意的理解以及对战国时代楚国各种社会制度的分析。

战国时代楚人祭祷的对象包括“天神、人鬼、地示”,李家浩《包山楚简所记楚先祖名及其相关问题》对楚先祖进行了研究;陈伟《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祇系统与享祭制度》(《考古》1999年第4期)、《楚人祷祠记录中的人鬼系统以及相关的问题》对包山2号墓卜筮简中所祭祷的神祇、祖先均有所研究;李学勤《论包山简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指出卜筮简中的“媿畬”即见于《楚世家》的楚先祖鬻熊。

一些学者对战国时代楚国的卜筮制度进行了研究。陈伟《试论包山楚简所见的卜筮制度》(《江汉考古》1996年1期)对于战国时代楚国的卜筮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连邵名《望山楚简中的“习卜”》(《江汉论坛》1986年11期)对卜筮简中的“习卜”问题有所探讨。

1996年8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伟的著作《包山楚简初探》,该书在考释竹简字词的基础上,对楚国的卜筮制度、神祇系统、享祭制度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及其专著《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对包山卜筮简作了综合研究。

(四)重新整合阶段。在这一时期主要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卜筮简进行重新整理。学者们已经开始了这种研究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2008年滕壬生编著《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著录了这五批卜筮简材料中的原篆字形,并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隶定。天星观1号墓卜筮简、秦家嘴卜筮简尚未正式刊布,《楚系简帛文字编》对于这两批卜筮简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宋镇豪《中国法书全集》(第1卷)对五批卜筮简的图版均有部分著录。2009年陈伟等编著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对包山、望山、葛陵三部分卜筮简的字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集释。重新整合将是今后卜筮简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四、卜筮简研究的前景

目前对于卜筮简的研究正处于“广泛研究”和“重新整合”的过渡阶段。就卜筮简研究的现状而言,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厘清,基本上可以通读,并且已经作为历史资料运用到对于古代礼俗和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之中。但是,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某些字词的释读仍处于讨论之中。如包山简250云:命攻解于渐木立,𡗗迟其𡗗而桓之。“渐”读为“斩”,“斩木”可为鬼魅使有祟殃,如《睡虎地简·日书甲种》“一〇九正貳”云:毋以木(未)斩大木,必有大英(殃)。《汉书·五行志》记载斩断之木可为变怪并复立于原处而自连属,“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又云“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尝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襄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又云:“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树僵地,围丈六尺,长十丈七尺。民断其本,长九尺余,皆枯。三月,树卒自立故处。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颀,木仆反立,断枯复生。天辟恶之。’”吴郁芳《包山楚简卜筮简牍试读》(《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读“渐木立”为“斩木立”,可从。但是对于“桓”的释读却仍然众说纷纭,《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包山楚简》)读为“逗”,林沅《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香港《东方文化》1998年第1、2期合刊)读为“树”。“桓”应读为“属”,在包山简中“所逗”篇之“逗”读为“嘱”(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豆”之字音近于从“属”之字,从“豆”之字可假为从“属”之字,那么“桓”可读为“属”。“属”可训为“连属”之意,如《书·禹贡》云“泾属渭汭。”疏云“属谓相连属。”那么包山简250为:命攻解于斩木立,且徙其处而属之。是说命攻解于斩断之树木徙于其故处复立,并自连属之者。

对于文字的释读必须对卜筮简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作出结论。如卜筮简中有一种名为“大央”的占卜工具,亦写作“大英”,见于天星观1号墓和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简中。何琳仪先生《新蔡竹简选释》(《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读“大央”为“大鼈”,认为是一种占卜所用大龟。但在天星观卜筮简中用“大央”占卜的卜筮辞中记录了卦画,移录如下(滕壬生编著《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174—1175页,附天星观楚简原大照片之四):

左师虘聘于楚之岁,夏夕之月己丑之日,应脉以大央为邱阳君[番]胜贞:既允处

其新室,尚宜安长处之。 (随/泰)。

记录卦画的占卜一定是撻策而筮,“大央”应是一种蓍草。

如果要将卜筮简文作为文献资料象《诗》、《书》一样为世人所接受并传承下去,那么一定要使卜筮简字词的释读规范并尽可能形成学术界的共识。

(二)对古代卜筮制度仍需深入探讨。中国自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一直延续着卜筮的习俗传统,卜筮简是战国时代楚人占卜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洞窥占卜古法之一二。卜筮简中尤以包山楚简出土时最为完整,是研究古代占卜制度的最好依据,可以廓清一些长期以来的学术悬案。如包山卜筮简中的“成套卜筮辞”为甲骨卜辞中“成套卜辞”(张秉权《论成套卜辞》,《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中研院史语所,1960年)的存在提供了有力支持。古人占卜的时候,往往于同一天或者近期由数个卜官对同一件事情进行数次占卜,为“一事数卜”,《礼记·曲礼》云:“卜筮不过三”,但卜筮简中“一事三卜”者有之,“一事四卜”、“一事五卜”者亦有之,这样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占卜记录就形成了“成套卜筮辞”。“成套卜筮辞”的占辞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古人占卜时还有“习卜”的习惯。在卜筮简中,“习卜”往往为“成套卜筮辞”的第四卜,可以改变“三卜”之后的占卜结果。“习卜”是古人人为地控制变通占卜结果的一种手段,成为人意以合乎天理的方式改变神意的方法,反映了人类意志可以凌驾于神灵意志之上的天道观。占卜是人类古老的习俗,结合传世古文献对卜筮简进行深入研究,以此来探索古代占卜的神秘规则。

(三)对楚人宗教信仰和社会礼俗仍需进一步研究。战国时代楚地淫祀之风盛行,卜筮简中楚人祭祷的是一个庞大的神祇系统,包括天神地祇、山川万物、祖先、鬼厉等等,在楚人的意识中以为万物皆有神灵,战国时代楚人奉行“泛神论”的宗教信仰。卜筮简中祭祷种类名目繁多并且进献的祭品丰盛,体现了楚人对神灵信仰的虔诚。当时的楚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宗族观念,在楚人的祭祖中充分体现着“民不祀非族”的理念,亲爱之情只限于宗族内部。望山1号墓的墓主悼固、包山2号墓墓主昭佗、新蔡葛陵楚墓墓主平夜君成均为王室血脉、半姓分支,他们对“楚先”、“荆王”、“夏王”进行祭祀;天星观1号墓墓主邱阳君番胜为历史上的番国后裔,只祭祀“番先”和“悼公”、“惠公”等番国先君;而秦家嘴三座小墓的墓主多祭祀“五世王父、王母”。在当时平民阶层的祭祀中盛行祭祀“五世王父、王母”,“五世”之内的子孙均对“五世王父、王母”共同进行祭祀,在宗族内部有了“五世”的观念。战国时代的“五世”观念与《礼记》中的“五服”之礼及后来的“五宗”之亲均有密切关系。总之,神灵崇拜充斥着楚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基于宗教崇拜的祭祀行为,已不再限于宗教领域,一则是上层社会祭祀的礼仪化,再者,普通社会亦相机形成了重实用功利的民间祭祀习俗”(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目前对于战国时代楚地宗教信仰和社会礼俗的了解只是停留在表层阶段,例如对“与祷”、“祷”、“就祷”等祭祷缺乏深层次了解,因此仍需对卜筮简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实现对楚人宗教信仰和社会礼俗的全方位认识。